

河南五年间

◎ 第一卷

徐光春 著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2004—2009

河南五年间

◎第一卷

徐光春 著

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写在前面的故事

我的人生拐点

上中学时,梦想当新闻记者;上大学时,专攻新闻专业;大学毕业后,一直从事新闻工作。在学新闻、干新闻、管新闻 40 年后的 2004 年 12 月的一天,中共中央一纸任命,让我离开了新闻工作的岗位,到河南省担任中共省委书记、省人大常委会主任。做新闻记者与当省委书记这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件事情,一夜之间在我身上连成一体,合二为一,风马牛相及了!对此,不仅我自己深感突然,社会上不少人也疑虑重重。但不管突然也罢,怀疑也罢,这毕竟是事实,这是当今中国最高

领导机关——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、政治局集体研究的决定。接到任命通知的第二天,2004年12月11日,我就急匆匆赶赴河南履新。从这一天开始,我踏上了从新闻记者到省委书记,从中央机关到地方党委这一人生的拐点。

一、梦 新 闻

我是穷人家的孩子。很难说清我是绍兴人,还是杭州人。我父亲是绍兴人,我母亲是杭州人,我出生在绍兴,3岁时随父母到了杭州,于是绍兴方面说我是绍兴人,杭州方面说我是杭州人。不过杭州、绍兴坊间都有个说法:“杭州萝卜绍兴种”,看来杭州人、绍兴人是区分不开的。也很难说清我是农民家庭出身,还是工人家庭出身。我父亲家是世代农民,我母亲家是开纺织作坊的,我在绍兴出生时,父亲还在家里务农,有时也做些小买卖。我3岁时,父亲到杭州务工,成为一名搬运公司的搬运工,母亲到纺织厂当了纺织工。好在如今对这种家庭有了一个新称谓,叫“农民工家庭”,看来比较时尚、比较确切的说法,我是“农民工家庭”出身。我有一个弟弟,比我小四岁。听我妈说,我本来还有个姐姐,但她出生不久患了病,无钱治疗,不幸夭折了。

我从小就很淘气,这在邻里间小有名气。上小学二年级时,一天放学后,我带几个小朋友在学校门前河边玩,发现河边有几个竹排,就跳到竹排

上去,你追我逃。不料几个孩子全跑到竹排的一头,竹排下沉,几个孩子全掉在水里,好在我们这些在河边长大的孩子都会游泳,就一个个爬上岸来,脱衣服、晒书包。我翻开书包一看,坏了,语文课本找不到了,肯定是书包没有系好,语文课本掉到水里被水冲走了。这可怎么办?回到家被爹、妈狠狠教训了一通。挨骂挨打不要紧,没有课本怎么上课,家里根本没钱买课本。曾经念过几年私塾的父亲,写得一手好毛笔字,他从隔壁邻居家借来我一个班同学的语文课本,用了两天时间,工工整整地用毛笔给我抄了一本语文课本,我就用这本父亲自制的语文课本,学完了这一学期的课程,考试成绩居然很好。

还有一件事,至今记忆犹新。小学四年级时,冬天里杭州下了一场大雪,到处是“白棉被”覆盖,好一个银色世界!孩子们在家待不住了,我动议:“找个地方,我们打雪仗去!”不是一呼百应,也至少一呼十几应吧,十来个孩子在我带领下,在田野里找了一块平坦的地方,把人分成两拨,把地划成两块,就疯狂地打起雪仗来,一时雪球飞射,相互追打,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忘了,更谈不上什么看书啦、作业啦,思想、力量……全都在这场雪仗的“拼杀”中。不一会儿,尽管雪地冰冷,但孩子们一个个汗流浹背,热气腾腾。正想休息一下再打第二场时,只见不远处,几个农民模样的大人飞跑过来,一边跑,一边喊:“小鬼,你们疯啦,把我们的芹菜地都踩烂啦!”我们一愣,低头一看,果真脚下是菜,好大的一片芹菜全被我们踩坏了。

眼见气势汹汹的农民手拿锄头向我们冲来，十几个孩子立刻四处逃跑，各奔东西。我躲进家前面一间废弃的猪棚里，吓得不敢出来，“这场祸闯大了，怎么办？”越想越害怕，加上天气冷，浑身发抖。过了一阵子，听见几个农民找到家里来了，诉说我们的“罪状”，要求赔偿。我听我妈在说：“太不像话了，你看着，他回来我们不打死他才怪呢！”农民说：“把孩子打死了没用，我们要赔钱。”他们的话，躲在屋前猪棚里的我，听得一清二楚。硬躲不是办法，躲了今天，躲不了明天啊！天晚了，我咬着牙，壮着胆回家了。刚一踏进家门，我爹就抓住我，用扫帚把狠狠地揍了我一顿，我一声都没吭。我真的明白了：“我做错了，闯了大祸！”这以后，十几个孩子的家里，凑了钱，向芹菜地的主人作了赔偿。

我从中学开始就偏科，重文轻理。在班里，我文科成绩总是优秀、拔尖，理科成绩中等、偏下。主要原因倒不是笨，而是兴趣不同，用力不均。我爱好写诗、作文、画画，学校组织学生春游、秋游，回来总要写几首诗，抒发抒发感情；学校组织大的活动，事后总要写点文章，表达表达思想；节假日时临摹几幅画，贴在家里墙上，也算装潢。尽管这些诗、文、画都很幼稚，难登大雅之堂，但培养了一种兴趣，确立了一个志向：将来，自己在这方面一定要有所作为！

初中毕业后，我考上了百年名校杭州市第一中学，原为杭州高级中学，简称“杭高”，前身是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、浙江第一师范学校，再早是

浙江贡院,是明清两代浙江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入仕的场所。学校曾留有贡院不少遗物,其中有多副为考生追求功名鼓劲的楹联,当时疏浚西湖的功臣、浙江巡抚阮元的楹联很是有味:下笔千言,正桂子香时,槐花黄后;出门一笑,看西湖月满,东浙潮来。民国后,沈钧儒、李叔同、夏丏尊、鲁迅、经亨颐等文化名人都先后在这里任过教。学校设有鲁迅纪念室,树有鲁迅铜像。我入校后,即被推荐担任学校名气最大的课外兴趣小组“鲁迅文学组”的组长。在这个兴趣小组里,我们请文学老师、作家、诗人、艺术家讲课,安排组员外出采风,进行组员作品评品,并选择优秀作品在油印刊物《鲁迅文学》上发表传阅,在学校很有影响。我印象里,我写过一篇游绍兴东湖的游记,在刊物上发表后,得到广泛好评,老师、同学都说写得有情有景有味。这以后,学校又让我担任了校刊《一中青年》的主编、校广播站的站长。当时,校刊《一中青年》和校广播站是学校最重要也是最有影响的两个宣传阵地。《一中青年》一周出一期,校广播站一天播三次,都是宣传报道学校生活中的大事、新事、喜事,我非常热爱主编和站长的工作。干着干着,我开始萌动这样的想法:今后能当记者、搞新闻多好!从这以后,我写诗作文的兴趣,开始从“风花雪月”和自我表现中走出来,走进了现实生活、大众思想、社会群体,侧重于新闻报道的写作、编辑和组织,不仅尽心尽责办好《一中青年》和校广播站,而且注意读书看报,观察和分析一些社会问题,心有所思,思有所悟,悟有所

得,就写下来向市内的报刊投稿。稿子的内容主要是反映学校生活、社会现象、读书心得等等,有时也写些与杭州有关的历史人物介绍,收集编撰一些生活谚语之类的小知识。因家境贫困,订不起《杭州日报》,每当稿子寄出后,我天天都会去街头阅报栏看报,看看自己的稿子登出来没有。几天看下来,没见稿子登报,心里就焦躁不安,一旦看见稿子登报,就欣喜若狂,那种甜蜜的滋味,如今还能品出来。由于勤奋写作,高中二年级时,我受聘担任了《杭州日报》特约记者。聘书是邮寄来的,薄薄的一张纸片,记得上面印着几行字:徐光春同志:经研究,特聘您为本报特约记者,希望您经常为本报写稿。落款为杭州日报社。拿到这张聘书,在学校,在家里,我对谁也没说,但心里还是高兴得几天都处在兴奋状态,因为从这张聘书中,我已朦朦胧胧地看到了我未来人生的前程,我今后从业的方向。与此同时,我还担任了校学生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。1963年暑期,在校党组织和团市委的支持下,校团委组织76名学生干部搞社会调查,写出12篇、共34万字的调查报告,最后选择其中五篇汇编成册,供学生阅读,其中有由我执笔撰写的两篇,一是《王安埠大队村史调查报告》,12000多字;一是《血和泪的控诉——沈宝英的家史》,8000字。这些都为不久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创造了条件。

1964年夏天,我要高中毕业了。记得班里第一次议论考大学的问题时,教师、同学问我:你考什么大学、什么专业?我脱口而出:中国最好的大

学,最好的新闻专业,将来我要当新闻记者!当时的中国,最好大学的最好新闻专业,就是“北有人大,南有复旦”。我报考的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,第二志愿是复旦大学新闻系。考试结果,一箭穿杨,我被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新闻专业录取。消息一出,学校高兴——杭一中多了一个高才生;家里高兴——世世代代出了第一个大学生;我自己更高兴——终于踏上了梦想之路。事后,说起我被人大新闻系录取的事,当年前去招生的人大新闻系蓝鸿文老师说,这一年人大新闻系在浙江只招生两名,杭州一名,绍兴一名。在录取我的时候,主要考虑两个因素,一是考试成绩,二是与新闻工作相关的其他条件,即我有从事过新闻工作实践的经历和社会工作的经验。前一个方面,与我类似的情况不只我一个,而后一个方面,与我可比的人没有。看来,我中学期间,担任过校刊主编、校广播站站长、校学生会副主席兼宣传部长、《杭州日报》特约记者的经历,为我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“保了驾”、“护了航”。我庆幸自己在人生之初有这样一段美好的经历。

二、学 新 闻

大学生活是多彩的,也是难忘的,尤其是我们这一届,经历了太多令人振奋又使人伤感的事情,一件一件印刻在自己的心里。1964年9月,我进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。当时的人大一分为

二,一部分在西郊,一部分在城内,新闻系、语文系、档案系在城内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民国时期段祺瑞执政府内办学。校园环境狭小拥挤,但毕竟是在当年的政府衙门,倒颇有政治文化氛围,也显得洋气、官气、傲气,大门前一对铁狮子日夜忠诚地守护着校园,似乎它们并不知道门里的主人已不是总理,而是一批莘莘学子。主楼里教室、礼堂、会议室、图书馆一应俱全,使用方便。

开学第一天,经老师推荐,全班同学鼓掌通过由我担任班长,负责全班同学学习和生活的管理。一年级第一学期,系里就给我们开了哲学、党史、新闻学概论、新闻写作、外语等课程,拉开了五年新闻专业学习的序幕。第二学期又开设了政治经济学、中国新闻事业史、外国新闻史、新闻采访学等课,学习的分量日渐加重,专业的特色日益突出,全年级50位同学一个个如饥似渴地听课、看书、写作,努力掌握着对大家来说都是全新的知识。作为班长,我不仅要自己学好,还要组织好、管理好全班同学的学习生活,所以压力特别大,半年下来,我瘦了四五斤,不过精力还是很充沛的,学习成绩不错,也乐于为同学们服务,同学们都亲切地叫我“大春”,以示尊重和友爱。

大学期间,有几件事一直深深地留在我脑海里。第一件事发生在一年级第二学期。新闻系搬到西郊校址后,学校了解到我在中学期间,曾是杭州市少年业余体校的学生、杭州市中学生篮球队的队长,于是要我担任人大田径集训队的队长和人大篮球队的队长。去不去?我思想斗争了好几

天。去,肯定要增加我的负担,影响学习;不去,失去了身体锻炼、工作锻炼的机会。我往深处一想,要当一个好的新闻工作者,不仅要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广博知识,而且还要有一副好的身子骨,脑子灵、手脚快、能实干、会吃苦,去体育集训队,能帮助自己练就一副好的身体,以适应日后繁重的新闻工作的需要。这样想,我就答应去集训队了。从此以后很长时间,学习、训练、管理这三副担子一股脑儿压在我身上。“学习的课程一节不能耽误,训练的内容一样不能缺少,管理的工作一件不能怠慢”,这是我给自己订的规矩。那时,我每天的日程是:早上6点到7点,带领集训队早训练。上午8点到12点、下午1点半到4点上课学习。下午4点到6点集训队训练。晚上处理班务、队务和自习,10点休息。满负荷地学习、训练、工作,几乎没有闲暇时间,成为班里最忙碌、最辛苦的一个,也是最充实、最有收获的一个。我以旺盛的精力投入学习,不仅专业课的成绩不错,还阅读了大量课外读物,精心做读书笔记,积累各类知识;在我的努力和同学们的支持下,我们班、我们集训队风气正、团结好、成绩优秀,受到系里和学校的表扬;我的身体很强壮,运动成绩有进步,在首都高校运动会上我参加铅球投掷比赛,获得第3名,我还参加了市里组织的横渡昆明湖的游泳比赛,展示了自己的游泳水平。大学生活的这段经历,为我日后的事业发展打下很好的基础。

第二件事发生在大学二年级。新中国成立后,大学新闻系一般只设新闻一个综合性的专业,

采访、编辑、摄影作为一门课程设置在新闻专业里。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,新闻事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大增,对人才的要求也进一步精细。根据这一形势,学校报经教育行政部门批准,同意在人大新闻系新开设一个新闻摄影专业,第一届学生定额20名。新闻摄影是新闻工作的一个方面,是新闻专业的一个组成部分,它必须具有新闻方面的基本知识,因此,学校和新闻系决定在已经学习了一年新闻专业的1964年入学的学生里招收,其实就是将我们这一届的新闻专业学生50人一分为二,其中30人继续学习新闻采编知识,另20人学习新闻摄影技能。这对我来说又是一次人生的选择,是继续学习新闻采编,还是转而学习新闻摄影?我想,新闻采编方面的知识,经过一年学习,其中的ABCD都大致了解,在新闻摄影专业的学习中还可以继续深入学习;而新闻摄影是一门技术性很强的业务,而且也是记者必备的技能,学习新闻摄影需要几个硬条件,一是要有照相机,二是要买得起胶卷、相纸,三是要有专门的暗房设施,这三个条件对当时我这样的大学生来说是不可能自己解决的。但那时的新闻界有看不起摄影记者的现象,认为摄影记者“头脑简单,四肢发达”,这显然是一种世俗偏见。我分析自己的状况:我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和写作能力,又学了一年的新闻学方面的课程,已为今后当文字记者、文字编辑打下了初步的基础,但对新闻摄影却是一窍不通,自学很难,如果能去新闻摄影专业学习,我就可以多掌握一门从事新闻工作的技能,为今后

的事业发展多创造一个条件,为人民服务多具备一个本领。想明白了,我就向系里递交了转入新闻摄影专业学习的申请报告,系领导考虑到我的政治条件和身体条件,很快就批准了我的申请,从此我转为新闻系新闻摄影专业的学生了,也是新中国第一届新闻摄影专业的学生。新闻摄影专业的学习,除了课堂讲授以外,很注重实际操作的训练,可是当时提供给学生学习用的设备很简陋,两人合用一部苏联产的“卓尔基”135相机,全专业共用一间洗印照片的暗房,所用胶卷是保定产的电影胶片,定量发放,按时使用,绝对不能浪费。学校或系里组织活动时,由新闻摄影专业的学生负责拍摄照片,作为学生的实习课。这中间,系里还组织学生到新华社摄影部去见习,了解新闻摄影工作的流程,加深对新闻摄影工作的认识,并到洗印车间实地操作。近一年的专业学习,使学生基本具备摄影记者的各项要求。对我来说,在已有新闻采编知识的基础上,又掌握了一门新知识、新技能,无疑在我人生前进的道路上,有了“两轮驱动”,这比“独轮前行”强多了,也稳多了。

第三件事发生在“文化大革命”中。1966年5、6月间,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了,一时大学成为“文革”的主阵地,大学生成为“文革”的急先锋。人大的学生在这股潮流的裹挟下,也迅速行动起来。不久,学校成立了两个群众组织。在这种情势下,我虽然也参加了其中的一派,但比较理性并富有同情心,对“文革”这种不仅动嘴动笔,而且动手动脚的非理性斗争,甚感厌恶,有时也会随大

流去参加批斗会,但只是站在一边听听而已。这年8、9月间,学生进行大串联。正在学校无所事事,既不参与,又不热衷批斗的我们几个同学,就商量出去“串联”。鉴于当时绝大多数学生的串联都是坐火车、坐汽车,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去“闹革命”,弄得全国火车、汽车人满为患,串联成灾,于是我们决定学习当年红军长征,搞“徒步串联”,到农村去,到山区去,到老区去,到革命圣地去,不是去闹革命,而是去学革命。我和新闻系、政治经济系、国际政治系五六个志同道合的同学组成了“步行串联队”,大家推选我为队长。我们还确定大方向是去延安,大原则是不去造反、不去扰民、只学革命,不坐火车、不坐汽车、坚持步行,不走城市、不住宾馆、吃住在农村,不吵不闹、不奢不骄、团结互助。我们计划从北京西郊人大校址出发,经北京、河北、山西、陕西四省市,最终抵达延安,历时一个半月至两个月走完全程。1966年10月间的一天,天气晴朗,秋高气爽,我们这支“步行串联队”整装出发了。每人身背一件行李,里面有被子、有替换衣服;肩挎一只小书包,里面有毛主席语录、笔记本、洗漱用品,另外还背一只军用水壶,每人手里还提着一根棍子,既用来行走助力,又用来防身自卫。队前打着一面小红旗,表明是人民大学学生红卫兵串联队。一路上,我们翻越一座座高山峻岭,蹚过一条条河流溪水,面对祖国的壮美山河,动情时,我们会站在高山之巅,面对苍穹天宇,大声叫喊:“我爱您,美丽的中国!”我们穿过无数城镇、乡村,尽管有的较为富

庶,有的还较贫穷,但都在发展,都在变化,人民群众对党对政府都心存感谢,对祖国的发展前景充满期待。我们常常住宿农家,与农民们同住一间屋、同吃一锅饭、同睡一张炕,有时还帮着干些农活。相处间,那一张张善良的脸,那一句句朴素的话,那一段段真实的情,深深地印刻在我们这些年轻大学生的心里,让我们较为真切地认识了中国的农村、中国的农民。我们走过一处又一处革命圣地:北京卢沟桥抗日纪念地、长辛店工人运动旧址,河北狼牙山五壮士跳崖处、平山县西柏坡中共中央遗址,山西阳泉八路军百团大战纪念地、文水县刘胡兰所在村,陕西延安枣园、杨家岭、王家坪、清凉山、凤凰山、宝塔山等革命旧址,洛川县洛川会议纪念馆、子长县瓦窑堡会议旧址,在这些地方瞻仰烈士陵园,聆听革命故事,寻访先烈故居,会见英雄遗属。山野中、墓碑前、屋檐下、展厅里,留下我们的足印,留下我们的身影,留下我们的泪水,也留下我们发自内心深处的声音:革命先烈们,你们安息吧!你们未竟的事业,我们来完成,我们一定能完成!在这四五十天的日子里,我们走山路、住农家,挨过饿、受过冻,崴了脚、伤了腰,淌着汗、流着泪,大家忍耐着、坚持着、前进着,行程约1500公里,最终到达中国革命的摇篮延安。到延安那天,我们透过薄薄的云彩,远远望见宝塔山上的宝塔,大家情不自禁地喊起来:延安到啦!于是,不顾疲劳,不顾伤痛,跳着、跑着、叫着,欣喜若狂,高兴得泪流满面,真有一股子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延安时的那种劲头、那种情景、那种体

验。这次“徒步串联”到延安的经历,是我人生阅历中最难忘的一段历程,它使我懂得了什么叫中国,什么叫革命,什么叫人生,什么叫奋斗。真的,这次我人生道路上最长、最苦、最难忘的“徒步长征”,使我懂得了很多过去并不完全懂的东西,我开始感觉自己真正长大了。

第四件事发生在1967年前后。按理说,经过“徒步串联”,应该大大增强“造反精神”,可是对我来说,我却更加怀疑这场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必要性和正确性了。“徒步串联”路上,尽管村头村尾的墙上刷着大幅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标语,房前屋后的大喇叭一遍又一遍唱着毛主席语录歌,但我们遇到的工人、农民、基层干部,对这场“文化大革命”大都不理解、不关心、不积极,脸上挂着疑惑和淡漠的神情,与他们当年支持共产党打鬼子、打老蒋、打天下的态度大不一样;一路上,我们看到在这场革命中,工人不上班了,农民不种地了,学生不上学了,士兵不练武了,好端端的一个国家乱了。于是,“为什么要搞‘文化大革命’”、“‘文化大革命’有必要吗”的问题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翻腾。“徒步串联”回校后很长一段时间,我就闭门读书,不参与学校的批斗活动。当时,我读了很多书,别的书不能看,我就天天读马克思、恩格斯、列宁、斯大林和毛泽东的书。一天,系里群众组织的头头找到我,对我说:你看那么多马列的书,你就出面帮我们新闻系做做宣传马列主义、毛泽东思想,批判资产阶级新闻路线的事吧。我想,做这件事与我读书不矛盾,也

不至于说我远离运动之外，就答应了。很快，我们联络了人民日报社、新华社、光明日报社、前进报社（经济日报社前身）等新闻单位，北大、北京广播学院等院校分别派人参加，以人大学生为主体，成立了“首都新闻批判联络站”，其主要任务是出版报纸，编辑学习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新闻思想的书稿，反映各新闻单位、新闻院系学习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新闻思想、批判“资产阶级新闻路线”的情况。联络站共有工作人员 20 多人，我总负责。我们成立了报刊编辑组、资料编写组、活动联络组和办公室。这项工作持续进行了将近一年时间，因为形势发生变化，学生要“回校闹革命”就自行停止了。做这件事，有三大收获，一是有条件深入学习马、恩、列、斯、毛的著作，尤其是有关新闻工作的文稿，我们编辑、印刷、发行了《马恩列斯论报刊宣传》、《毛泽东论新闻工作》两本言论摘编书稿。二是第一次亲自组织编辑出版报纸，从征稿、写稿、编稿、排版、校对到印刷、发行，报纸工作的全套活都干了，把上课时学的、没学的，这段时间里都实践了、学到了。我不仅对每期报纸要终审和定稿，而且一些主要的文章亲自写，对报纸“总编辑”的工作进行了实践演练。三是培养组织才干。严格地说，当时我们还是在校学习的学生，并不接触社会生活，但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风暴，把我们卷到社会上来了，通过这段时间的工作，面向新闻界，面向全社会，在对社会加深了解的同时，也培养了自己社会活动的能力。

写到这里，需要提到的是，在这段时间的工作